

# 明代蒙学“考德”之探微

刘光华, 吴瑾菁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道德源于生活,成于实践,个体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离不开日常行为训练。明代蒙学以“考德”强化儿童的日常行为训练,促使儿童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对明代蒙学“考德”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究,可以为当前中国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思路。

**关键词:**考德;童蒙;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8)01-0048-08

## The Study of primary school “Moral Investig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LIU Guanghua, WU Jinji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Morality comes from life, into practice, and the individual good moral quality can't be formed without daily behavior training. In the Ming Dynasty, primary school intensified children's daily behavioral training with “moral investigation” to promote the nurturance of children's good behavior habits. In-depth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method of “moral investig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can provide useful ideas for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minors in current China.

**Key words:** moral investigation; ignorant child; moral education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未成年人道德问题频发,如何解决未成年人道德教育之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sup>[1]</sup>纵观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中汲取有益元素,为当下社会道德建设提供积极参考。在现有研究成果之中,从教材分析、教育内容解析等方面对古代儿童道德教育进行研究的较多,但是从课程设置角度对儿童道德教育进行研究的成果极为鲜见。为此,对明代蒙学“考德”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究,可以为当前中国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思路。

### 一、缘何考德——明代蒙学考德之宗旨

《礼记·学记》有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教化以学校为本。”<sup>[2]</sup>学校自古被认为是礼仪所由出,人才所由兴的重要机构,为了善风俗、行教化和培养符合朝廷统治需要之人才,明代大力兴办蒙学,以伦理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大兴教化。明代蒙学逐渐形成以道德教育为主,以识字教育和知识

收稿日期:2017-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研究”(编号:16AZX023)

作者简介:刘光华(1977-),女,湖北随州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

吴瑾菁(1973-),女,江西上饶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为辅的教育格局。在明刑弼教的明代,无论是行教化之需要还是为朝廷培养维护其统治需要之人才,都需要通过道德教育培养遵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维护封建礼教的顺民和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能够以身示范的良臣,所以自蒙学教育始就以封建道德为主对儿童进行教育,为培养顺民和符合朝廷需要的官员打下良好的基础。

### (一) 儒学对德教之重视

道德教育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一向为历代思想家、教育家所重视,尤其是倡导“德治”的儒家,主张通过“反省内求”的方法,使个人的行为同封建道德相吻合,为封建统治和政权的巩固培养人才。儒家注重道德修养,主张以修身为本。修身包括修德与修智,德才兼备是修身的理想结果,然事有先后,孔子认为应以修德为先。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sup>[3]</sup>主张教育弟子应先“行”后“文”,先以“孝悌”“谨信”“仁爱”导之以行,行有余力然后“学文”。不仅如此,孔子还尤为重视早期的养成教育,认为“少成若天性,习贯之为常。”<sup>[4]</sup>指出早期的道德教育对于个人道德品质培养的重要性。

至宋代,以儒学新形态出现的程朱理学更是将封建伦理道德推上“天理”的神圣化地位,高度重视道德教育,强调通过教育“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认为:“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sup>[5]</sup>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对于早期教育,朱熹认为:“蒙养弗端,长益浮靡。”<sup>[5]</sup>指出应及早对儿童“教以事”,用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儿童的言行举止,使儿童在日常生活和具体行事上熟悉道德。至明代,在朝廷的推崇之下,程朱理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统领思想文化领域,“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sup>[6]</sup>儒学重德育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明代的社会治理。明代在全国大兴教化,并且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以加强青少年德教,先后开办了国子学、地方儒学、府州县学和社学,这些教育机构与私学一起构成完善的教育体系。教育体系的完善使得各级教育能够各司其职,教育目标能够得以实现。在儒家看来,“小学之教”应重于儿童的道德品格培养,<sup>[7]</sup>以便为“大学之教”讲求治国平天下打下基础。有明一代,儒家的早教思想使蒙学将道德教育置于首位,德教几乎成为蒙学教育的全部。

### (二) 行教化之必然

明代是建立在元代废墟上的朝代。孟森先生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sup>[8](p35)</sup>这种无制度化极大地破坏了殷商传承下来的礼法制度,导致明代建国之初整个社会礼崩乐坏、秩序混乱,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sup>[9]</sup>“为治之道,必本于礼。”<sup>[2](p1284)</sup>为了重整礼法制度,天下初定,朱元璋“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老儒,分曹究讨。”<sup>[2](p1223)</sup>并指出:“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sup>[10]</sup>遂在全国大力开办学校进行道德教化,希望藉以改善明初社会无礼、无序的现状,维持封建等级秩序,加强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明代统治者意识到儿童道德教育在全民道德教化中的重要性,通过学校这一有效途径来培养儿童良好道德品质。全国上下在办学时都强调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教化,如魏校在《谕民文》中说“兴社学以正风俗,事朝廷以文德治天下教化与太平”。<sup>[11]</sup>陈献章在《程乡县社学记》中也如此说:“社学之建,在今日所以淑人心、正风俗、扶世教之第一义。”<sup>[12]</sup>宋濂也曾明确指出在长洲练氏设立义塾之意图在于“化其闾巷之民”,使之“皆知尚礼义,耻犯法”。诸如此类言论,比比皆是。<sup>[13]</sup>可见,朝廷设立社学之主旨在于更广泛地将其统治思想贯彻到下层社会,以程朱理学教化于民。

### (三) 朝廷人才培养之需要

朝廷道德教化之首要任务在于培养人良好的道德品质,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于国家人才培养机制而言,在于培养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即通过教育培养“内圣外王”的合格人才。所以明代蒙学注重道德教育还基于为朝廷培养合格人才的考虑。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颁文谕给太学学官时强调:“治天下以人才为本,人才以教导为先。今太学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艺者,遵古制也。”<sup>[14]</sup>指出道德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和首要任务。洪武五年(1372年)再次指出:“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把“德”作为朝廷人才选拔的首

要标准。蒙学教育自然也就不能违背这一要求。朝廷曾明令蒙学要注重礼仪教育,“讲习冠、婚、丧、祭之礼。”<sup>[15](p455)</sup>更为重要的是,明代思想家们对于儿童道德教育也极为重视。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指出:“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吕坤撰写《蒙养礼》对儿童进行礼仪规范教育:“儿童手足能动,不可妄有执持,令之作揖拱手。小儿初学,不可令其学打人、骂人以为乐,而要使之学习深揖、高拱、徐拜、应对、揖让、称呼、定省等礼仪。”<sup>[16](p1342)</sup>霍韬认为:“童子于礼,由幼而习,以至于冠,步趋食息皆囿范围,则非僻之心不能投间而入,中和之德日益纯固,资虽下愚亦可以寡过矣。”<sup>[17](p330)</sup>在明代的士人看来,从小对儿童加强礼仪为主的道德教育可以稳固“中和之德”,即便是资质愚下的人通过道德教育也可以少犯错误。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等人所主张的儿童道德培养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发展儿童的独立人格,而在于满足国家统治之需要。

## 二、何以考德——明代蒙学考德之具体方式

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道德主体的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而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主要通过道德主体的行为得以体现,因此行为习惯的培养至关重要。明代蒙学考德通过对儿童的日常行为进行反复考察,强化道德行为训练和提高,从而让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道德教育的方法上看,类似于儒家传统道德教育方法“自省自克”。有明一代,朝廷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使“考德”在蒙学之中普遍存在,成为蒙学每日必行的道德教育方式。

### (一) 明代蒙学课程中的考德安排

明代蒙学的课程设置大多是由各级政府官员编制并付诸实施的。考德是蒙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政治教化与培养人才的双重需要使明代的蒙学极为重视道德教育、重视行为习惯的培养。这一主旨直接影响到明代的蒙学课程设置,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学者在设置蒙学课程的时候都把朝廷的政治需求放在首位、把宣传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基本前提。在现存的史料中,关于正德、嘉靖之前蒙学课程设置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此前的蒙学课程设置情况不得而知。正德、嘉靖之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逐渐增多。现存的关于明代蒙学课程的史料比如王阳明的《社学教条》、沈鲤的《义学约》、桂萼《社学图说》、吕坤的《社学要略》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蒙学的课程设置。在众多课程设置之中,我们选取当时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课程设置进行研讨。当时社学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魏校开办的社学和王阳明开办的社学,民间开办的私学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沈鲤开办的义学。

明嘉靖年间,魏校任广东提学副使,指出“社学之教至重至急,凡为师弟子者当慎修其事。”<sup>[11]</sup>遂在广东大兴社学,并亲自设计社学课程(参见表一)。魏校要求“小学之教”应遵循古制“先行后文”,培养儿童良好的德性,以期“化民善俗、育才成治”,否则“乡无善俗、世乏良才”。他说:“古人八岁皆入小学,其教先行后文,礼陶乐化笃信力行,由此而入大学,故进善者多。今之教舍行趋文,使蒙者益以荒惑童习,而长安之故,为善者少有,质美好学者亦不免蔽于未艺……”<sup>[11]</sup>

表一 魏校的社学课程设置

	常规课程	特别课程	校外
早学	①课前行为检查。 ②分班听教师教授《童蒙训》或大学之道 ③学生看或记诵所讲内容		
午学	①课前行为检查。 ②抄写诗章 ③歌咏、记诵所抄诗章	①每月朔望放假 ②每月初五、十二、二十、二十七 日习射	①温习所学 ②课外行为检查。 ③行为自我约束。
晚学	①课前行为检查。 ②习礼 ③教琴 ④讲习六书、九数、五御之法 ⑤记诵《童蒙训》或教以古人嘉言善行 ⑥有余力者,听习乐歌咏		
备注	①各课皆包含课堂行为检查。 ②每月朔望放假		

资料来源《庄渠遗书》卷九《岭南学政》。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魏校的社学课程设置之中,早、午、晚学都有课前行为检查,各课之中皆包含课堂行为检查,校外还有课外行为检查和行为自我约束,学校对“考德”的重视可见一斑。作为明代蒙学界的主要代表,魏校的课程设置不仅在广东地区以行政命令的手段予以具体实施,而且对明代的一些思想家如黄佐、叶春及等的课程设计和教育实践具有相当影响。黄佐制作《泰泉乡礼》时对“乡校”的课程设置引用了魏校的有关主张,规定要随时督察儿童的行为仪态。先后建立社学二百一十九所的惠安令叶春及在制定社学课程时也参考了魏校的课程设置,课前、课堂、课外均有行为仪态督察,把道德行为考察作为每日必不可少的教学活动严加贯彻。<sup>[7]</sup>王阳明在赣南开办的社学在明代中晚期也具有较大影响。在王阳明的社学教约中,把“考德”作为每天正式上课之前的首项活动,要求:“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sup>[18](p100)</sup>

除社学之外,民间自办的蒙学也把道德考察作为重要的教育活动。“三代帝王师”沈鲤晚年在家乡商丘设私塾,办义学。在《养正类编》卷四《义学约》中可以看到,沈鲤取消了惯常的习礼课,将其改为行为仪态督察和贤孝勤学故事学习,讲书、故事、吟诗皆含道德教育,每天早晚学上学之时、教学时都对儿童的行为仪态进行督察。

由上述可见,在明代蒙学教育中,无论是地方官员主办的社学还是民间自办的私学在课程安排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将考德活动罗列其中,不仅在每天的上课之前、课堂之中,而且在课堂之外都对学生的行为仪态随时进行督查,将“考德”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的始终。

## (二) 明代蒙学考德的具体化与多样化

由明代蒙学课程设置中对考德活动的安排可以看出,考德是每日进行的重要道德活动。然而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观念标准、意识形态,难以量化,何以考德?

明代蒙学考德活动通常由教师于每日清晨组织进行,主要以逐一询问的形式考察儿童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操守,并对表现优秀的学生予以表扬,对表现欠佳的学生进行训斥。也有一些学校由家长协助学校共同完成。此外,在课堂之中、课堂之外都随时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监督,提醒学生注意自我行为约束。明代蒙学考德的内容极为具体,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坐立行走到对父母的晨昏定省、日常应对。比如王阳明要求每日清晨学生参拜行礼完毕,由教师按照顺序,遍问各位学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怠,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饰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sup>[18](p100)</sup>各位童子务必据实回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吕坤对考德的内容则提出更为详尽的要求,如“每日早起,向父母前一揖,问曰:今夜安否?早饭、午饭回家,见父母,揖,问曰:父母饮食多少?晚上,看父母卧处,待父母睡毕而后退。父母怒骂,跪而低头,不许劲声强辩。父母勤劳,即来待作。父母久立,忙取坐物。父母唤人,高声代唤。父母疾病,煎汤尝药。此虽人子末节,少年先须日习。至于一家尊长,俱要恭敬。家中凡事忍默。”<sup>[16]</sup>将儿童如何对待父母的饮食起居、教导服侍都列入考察范围。

虽然明代蒙学考德在内容上均是以个人行为规范和事亲为主,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方式方法上不同的学校则有所不同。比如在考德活动的参与主体方面,吕坤和魏校所办的社学都要求家长参与活动,由家长对儿童的校外道德行为进行监督并将考察情况告知学校,学校根据儿童的表现分别给予表扬、批评或体罚等家长参与监督。魏校还明确提出:“生徒有过失者,或居家得罪父兄骨肉、或出外得罪乡党朋友、或自己所为有失,即当直告于先生。”<sup>[11]</sup>比如在考德的方式上,魏校不仅要求社学每日考察学生的事亲与个人言行事宜,还特建社学大馆供社学诸生学习礼乐,并于每年正月望后择社学中年长的生徒至社学大馆考其德。“生徒当日者须黎明至学,先生前一日列生徒长少之序挂于门内东西两壁,生徒至,依序立于两阶下,点洒扫者先以序入,执事其余轩舍以役人代之,毕复降阶立原位,观其执事,恭谨者录之,怠忽者教而责之;次择替礼者二人先升堂正揖,分班立先生之前唱序立,诸生以序两班升堂正立唱揖,分班圆揖就位静声端正良久,以观其德容,命执事者击云板命年长在上以次序坐,务使从容严静良久。”<sup>[11]</sup>午学教以歌咏,期间观察诸生行为表现,“歌毕者命复位坐听其声容,温雅广大者录之,清丽俊逸者录

之,静正简淡者录之,如躁涩俗弱妖艳凄楚者教而革之”<sup>[11]</sup>。晚学“命习礼未出位者命坐没办十人,出就先生位前,东西向立,东先出位,北面立,长束少西,四拜习揖毕,复位西拜揖如仪退,先生做光其容体恭肃愷者录之,鄙倍者教而责之”<sup>[11]</sup>对参加大馆的生徒进行严格的洒扫应对礼仪考察。

概言之,明代蒙学考德主要是通过询问儿童日常道德实践状况、观察儿童习礼时的言行举止来对儿童的道德行为作考察,再结合各人不同情况进行后续教育。

### 三、考德何用——明代蒙学考德之价值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价值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使个体能够按照社会成员所认同的行为规范引导自身的行为实践。只有道德行为而没有道德知识则行为是粗鄙的,只有道德知识而没有道德行为则是虚浮的。道德教育不仅要道德主体进行必要的道德知识的灌输,还要让道德主体积极参与,将道德知识内化为道德情感,外化为行为实践表现出来。儿童时期行为习惯的养成状况关系到个体一生的道德水平。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经指出:“道德行为训练,不是通过语言影响,而是让儿童练习良好道德行为,克服懒惰、轻率、不守纪律、颓废等不良行为。”明代蒙学考德活动立足于生活,通过强化道德行为训练来加强道德认识,从而养成个体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达到道德的知行合一。

#### (一) 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童蒙<sup>①</sup>教育有利于道德的“知行合一”

道德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道德的最终指向就是帮助人们达成真正的“好生活”。然而,真正的“好生活”只有在具有良好德性和健全人格的人群中才能实现。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培育儿童良好的德性和健全的人格而实现人们的“好生活”。道德教育实质上是道德理性的养成和道德行为习惯的训练,那种停留在道德说教甚至停留在“德育课程”的道德教育必然是无效的道德教育。良好的德性只有在现实生活才能够养成,所以道德教育应立足于生活、回归生活。

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的莫过于家庭生活。儿童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度过,明代蒙学道德教育正是密切联系儿童的家庭生活,以“孝”为切入点,以家庭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从与教育对象关系最为亲近的家人入手对儿童进行道德品质的培养,便于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理解与认同,有利于道德情感的培植与发动。儿童心智处于尚未长成时期,对知识的接受和理解能力有限但是具有较强的观察与模仿能力。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和生活礼仪是操作性极强的行为规范类教育,明确告诉人们该怎样去做,这种实践性极强的教育内容既贴近生活实际又简单易懂,易于被理解和接受,以其为切入点进行道德教育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以家庭伦理道德规范作为教育内容有利于儿童道德上的知行合一。家庭是儿童生活的重要场所,家庭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亲情和长期耳濡目染的言行影响,使家庭伦理道德规范能够自然而然地为儿童所接受。明代儿童道德教育在内容的选择与安排上结合儿童年龄及认知特点,贴近生活,从力所能及、确实切己的平实处入手,以使其能够身体力行。“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sup>[20]</sup>循序渐进、逐步深入,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做到知行合一。

#### (二) 立足于持之以恒的童蒙考德有助于个体良好道德的养成

儿童道德教育在个人道德养成中处于“正其始”的重要地位,良好道德的养成与个人幼时的道德教育密切相关。正如黄佐所言:“民生有欲,非教不善。……然学有大小始终,今社学之设,所以正其始于先。于是教以大人之学,斯可成其终于后。”<sup>[14]</sup>

道德是一种外在于道德主体的、不以道德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要求和社会理性,如何让这种外在的规范与原则为道德主体所认同、接受并付诸行动是道德教育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习惯的养成需要借助于长期的、反复的行为训练,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是长期行为训练的结果。个体道德的形

<sup>①</sup> 《易·蒙卦》中有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此为我国古代史上关于童蒙的最早相关记载,也是我国关于蒙学的最早论述。古代的蒙学教育是针对6到15岁之间的儿童进行的,据《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岁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所以童蒙是指6到15岁的未成年人,本文中所讲童蒙采用这一说法。

成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经历抵触、在外在强制下的道德行为模仿、行为依从到自觉践行的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之中,反复、枯燥的同一行为训练时刻考验着行为主体的忍耐力,行为主体的坚持与否直接决定习惯培养的结果。对于认识有限、自制力较弱的儿童而言,养成良好道德行为习惯最为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持之以恒的行为训练。正如王阳明所说“日使之渐于礼仪而不苦其难”。

明代从事童蒙教育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广泛共识的。黄佐《泰泉乡礼》卷三《乡校》有云:“社学之教,不专于念书对句,务要教其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习礼乐,养性情,守教法,禁游逸,远玩好,戒骄纵。如此教之,斯可变化气质,为大学之基本。今人空教子弟念书对对,念得对得,固是子弟聪明,但不知子弟情性何如,气质何如,事亲何如,交友何如。手不执洒扫之事,身不习趋事之劳,耳不闻正乐,目不见正礼,随子弟自家资质做去,多有率意妄行、习与性成、恶人同归者也。至于入大学之时,气习已深,不复自知其非,所以陷于一偏而不能有成者众矣。”<sup>[21]</sup>在明代其他童蒙教育文献中,考德的内容与思路大都与此相近。童蒙教育家们特别重视通过儿童每日生活中的近在身边的小事,以校正儿童的道德认识,去除儿童的不良习气,养成儿童明理、正心、谨言、慎行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如在魏校、黄佐、叶春、沈鲤等的课程设置之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考德是每天都必须进行的课程之一,并不是偶尔为之的应景之作。如王阳明在《教约》中要求“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sup>[18]</sup>吕坤在《社学要略》中也提到“童子每日早起,向父母前一揖”。<sup>[16]</sup>而且每天考德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一样的,都是以相同方式、对同一内容的考察。从王阳明的《社学教条》和吕坤的《社学要略》中都可以看出,每天考察的内容都是与家庭伦理道德相关的日常行为规范。通过这种反复的强化巩固儿童的道德知识、加深儿童的印象,督促儿童将所学道德知识运用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做到以知导行、以行固知,使道德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有助于个体良好道德的养成。

### (三) 立足于行为训练的童蒙教育有利于道德的践行

行为德之基。道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实践精神,善不能仅仅停留于口头,必须落实、表现为行动,只有知善而行善,外在的道德规范才能够内化为个体的品德。从个体道德发生的角度来看,儿童最初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形成过程来源于父母长者的行为指导,父母及长者对儿童言行举止的奖励或惩罚使儿童的这些言行举止在长期的生活训练中逐渐转化为道德行为习惯,并在日后的生活中以条件反射的方式体现在相应的情景上,促使其自觉按照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行事。正如儒家所强调,以“小学之教”培养童蒙良好道德品质才能为“大学之教”更高层次的道德教育奠定基础。

正如相关学者所概述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观点:“美德有两种,即心智方面和道德方面的,心智方面的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大体上归功于教育;而道德方面的美德乃是习惯的结果。”<sup>[22](p317)]</sup>强调良好道德是由“心智方面的道德”和“道德方面的美德”两个方面组成,而“道德方面的美德”即形成德性的道德,不是靠教授得来的,是生活中训练的结果。良好道德的养成必须建立在行为训练的基础之上。儿童处于道德懵懂时期,理解能力欠缺,道德水平有限,仅仅通过道德知识的灌输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行为练习比知识灌输更加具有吸引力,更容易为教育对象所接受、符合教育对象的道德发展规律。将道德知识教育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训练相结合并日益强化,宜于培养教育对象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朱熹曾指出:“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因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之节与夫六艺之教。”<sup>[23]</sup>陶行知也认为:“真正的训育是品格修养之指导,我们要在‘事’上去指导学生修养他们的品格,事应当怎样做,学生就应当怎样修养,先生就应当怎样指导。”<sup>[24]</sup>强调在“事”上下工夫,主张有意识地加强对儿童道德行为实践的引导,以习惯养成促进道德的践行。我国儿童道德教育效果不尽人意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过于强调灌输、缺乏必要的行为训练,道德主体被置于被动的无条件的服从地位,这种被动的道德教育忽视了道德主体的主体性与参与性,无法调动道德主体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甚至会引起主体一定程度的反感,产生消极抵抗情绪,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此种教育模式的最终结果是道德主体所学的道德知识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指导其行为,造成知行脱节,必然带来社会的道德缺失现象。从明代的童蒙考德来看,其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坚持从持之以恒的行为训练入手,以日常行为的教化和巩固

来实现封建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

由此观之,明代童蒙考德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值得借鉴与吸收的。社会主义道德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对人类历史上优秀社会道德规范加以继承与创新的产物。社会主义道德的践行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实践。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成员的总体道德状况良好,但不可否认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来说,如何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刻不容缓。在个体道德培养机制中,从日常生活出发,持之以恒地进行行为训练对良好道德的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计划、有目的对道德主体进行训练,使道德主体对道德规范形成一定的认知和情感体验,从内心认可、接受道德行为所代表的道德规范,将道德规范纳入自身的认知和价值系统,使自己按照社会普遍的道德规则自觉行动,逐渐养成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良好行为习惯。儿童时期养成的良好道德习惯必然促进个体优良道德品质的形成,从而在实际生活中严格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约束自我,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的践行。

#### (四) 明代童蒙考德有利于现代童蒙教育回归“适合童蒙的教育”

明代童蒙考德立足于生活实际,以持之以恒的行为训练强化儿童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值得我国现代童蒙道德教育借鉴。

道德教育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生活世界是道德的意义和价值的源泉。教育内容是否贴切生活、切合实际直接关系到道德主体能否将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相结合,能否将所学道德规范运用于生活实际。童蒙道德教育在内容的确定上应面向生活,植根于生活。生活是多元的,童蒙道德教育内容到底该从那种生活着手还需进一步明确。目前,我国小学德育内容几乎涵盖一切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与要求,实际上是在以一种“完人”的标准来要求小学生,这明显是背离了儿童的心智特点与发展规律。道德教育内容的制定要考虑其可行性。既然道德教育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生活,那么道德教育所传授的内容就应该能够为教育对象在日常生活中所用,贴近生活的道德教育才容易被教育对象所理解、所接受,才能够真正实现学以致用。童蒙阶段所接触的环境有限,主要是家庭成员与老师同学,因此,在选择教育的内容时应该考虑儿童需要的是什么样的道德,或者说在童蒙时期,他们需要用到哪些道德规范来指导、引导现实生活。童蒙道德教育内容需要参照儿童的全部生活并考虑其可能的影响,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成为道德教育内容选择的重要依据和方向。“唯有道德回归生活并能够回应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伦理生活才能真正成为人们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从而避免道德教育的空洞性。”<sup>[25]</sup>华而不实的教育内容所带来的必然是无效的教育。

从道德养成的规律来看,个体良好道德的养成需要经历从内化到外化、由他律向自律转化的漫长过程,是长期的、循序渐进教育的结果。一种社会规范为个体所接受并最终自觉行为体现出来离不开有目的的训育,对于儿童而言尤其如此。我国现代童蒙教育表现得过于急于求成,道德教育“课程化”使得道德教育表现为纯粹的道德知识灌输,学校对道德行为训练缺乏必要的重视,现有的所谓道德实践活动往往表现为一种公式化、机械化的行为表演,学生对活动缺乏兴趣,往往是将活动视为任务被动参加,这种实践活动只能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实际效果。让童蒙教育回归适合童蒙的教育成为当前童蒙教育的必然趋势。在道德养成的过程中,由学而知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道德理论的学习,才能将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自身的道德知识,从而明辨是非善恶。但是仅有道德知识是无法形成道德品质的,只停留于道德认识而不能付诸道德实践的道德教育是没有意义的。儿童的思维发展水平处在由具体运算向形式运算的过渡阶段,在道德发展上的取舍往往是根据道德情感而非道德知识,试图仅仅通过道德理论灌输来提高儿童的道德认识水平、培养儿童良好道德品质并非明智之举,其效果必然是差强人意的。将理论灌输与实践活动有效结合,以“训育”让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儿童良好品德才是应然之道。爱动是儿童的天性使然,“活动”和“体验”是童蒙道德教育最核心的要素。儿童的道德认识不是通过理性的思辨方式建立起来的,而是经验积累的结果;优良的情感与意志也只有融会于实践行动之中才有意

义;行为规范只有通过反复演练,才能变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现代童蒙教育应借鉴明代考德之经验,结合儿童特点,回归儿童生活,落实行为训练,使童蒙教育回归“适合童蒙的教育”。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 2016-05-18.
- [2]张廷玉 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论语·学而.
- [4]大戴礼记·保傅.
- [5]朱 熹.朱文公文集(卷 69) [A].学校贡举私议[C].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0.
- [6]陈 鼎.东林列传·高攀龙传[M].南京: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07.
- [7]叶春及.备忘集 石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8]孟 森.明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9]吕本辑.皇明宝训[M].明万历三十年(1602 年)周氏大有堂刻本.
- [10]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 [11]魏 校.庄渠遗书[EB/OL].<http://www.docin.com>.
- [12]宿州县志卷二.
- [13]顾明远.历代教育制度考[A].中国教育大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14]南雍志卷一事纪一.
- [15]申时行 等.明会典卷 78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6]吕 坤.吕坤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7]霍 韬.渭厓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19]朱 熹.论语集注卷十九子张[M].读书中文网电子书.
- [20]黄 佐.泰泉乡礼卷三乡校[EB/OL].国学导航 <http://www.guoxue123.com/>.
- [21]张法琨.古希腊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 [22]王星贤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8 [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3]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 [24]王淑芹.道德教育低效化审视[J].思想教育研究,2007,(9).

(责任编辑:余小江)